

大后方文学研究综述:现状、概念及边界

蓝善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桂学研究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简称。学界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文学史编纂、各体文学、文学组织、文学刊物、文学活动等方面。基于此,进一步拓展研究路径、开拓研究视野则是推进大后方文学研究出新拓深的重要方法。理清大后方文学的内涵,需要对大后方文学的时间和空间范畴进行界定。大后方文学应以1938年3月“文协”成立为时间起点,以1946年5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终刊为结束,其核心地域为重庆,而区域范围与边界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关键词:大后方文学;抗战;综述;概念;边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3-0046-06

确切而言,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简称。从学术史来看,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动脉,也是其延伸和拓展,以其丰富多彩的样态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研究大后方文学,考察大后方文学建构和变迁的历程,对于激活中国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脉络,塑造国民性,正确对待历史,准确把握文艺的本体价值,重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深化大后方文学研究,首先需要不断地对研究本体进行自我反观,精准把握研究对象本身的内涵和外延。

一、大后方文学研究综述

大后方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与大后方文学几乎同步的过程。尤其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蓝海的《抗战文艺运动史》推出,以抗战文学为主导的大后方文学研究就在摸索中曲折发展。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除了大量期刊论文外,就现有著作成果而言,大后方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研究路径: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汇编。1980年,法国巴黎举行抗战文学讨论会,此后,中国抗战文学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第一个抗战文学学术团体在重庆成立,其创办的《抗战文艺研究》也成为

第一家抗战文学研究专刊,标志着新时期的抗战文学研究进入了活跃期。1989年出版的林默涵总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共10编,填补了抗战文学中大后方文学丛书、选集出版方面的空白,其中收集了不少文艺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或相关报道。依托西南大学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近年也推出了一些供大后方研究的文献,其中《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系列出版了《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2011)^[1],为研究大后方的抗战文艺动员搜集了不少歌谣作品资料。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师范大学合编的《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属于上述丛书系列之一,其中《战时文化》(2017)^[2]辑录了不少档案文献和历史报道,为研究陪都文化和战时陪都文艺打下了更为全面、系统和翔实的史料基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1983)^[3]、《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1984)^[4]的整理出版,丰富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后方文学研究的史料,尤其是对文协和战时文艺报刊等方面的史料整理,直接促成了21世纪的大后方文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二是大后方文学史的编纂。1947年田仲济以蓝海的笔名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5]是中国第一部抗战文学史专著,海内外不少抗战文学研究都是在该成果基础上进行拓深,该著也为大后方文学

收稿日期:2020-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学编年史”(19BZW1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民族国家文学研究”(SWU1709103)

作者简介:蓝善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抗战大后方文学、桂林文化城。

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依托地理空间、文献资源和历史渊源的优势,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大后方文学研究的重镇。1985年文天行整理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6]促成了大陆抗战文学研究进入热潮。1988年则是大后方文学史成果丰硕之年,这一年,四川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涌现出的学者及其著述受到海内外关注。该丛书中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7]为日后大后方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吴野和文天行共同主编的《大后方文学史》(1993)^[8]从文体角度分别论述抗战时期大后方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通俗文学、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重要作家作品等。苏光文专事抗战文学和大后方文学研究,其论著《大后方文学论稿》(1994)专门论述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被认为是“分量较大的自成体系的学术论著”^{[9]2}。其近作《大轰炸中的重庆陪都文化》(2015)^[10]对大后方的中心重庆在文化组织机构、文化思想理论及论争,以及各体文学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刘勇、李怡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11]以时间顺序编年的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试图建构一个文学的谱系。其中,李怡和孙伟主编的第九卷(2016)、张武军和黄菊主编的第十卷(2017)根据最新的史料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研究抗战文学和大后方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依托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等相关研究机构推出不少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并建立起了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库。其中,“重庆抗战文学研究丛书”系列受到学界关注。另外,港台学者曾整理出版过《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海外学者中也出现了抗战文学研究的热潮。

三是大后方各体文学研究。大后方文学的整体构成中,诗歌因其更为符合战时宣传动员精、短、快且便于朗诵的需要,而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样,大后方诗歌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诗歌研究史料选》(1989)^[12]、《抗战诗歌研究史稿》(1991)^[13]都属于上文提到的《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之列。前者辑录了抗战时期有关诗歌研究的不少史料,其中包括大后方举办“关于新诗的用字和造句”座谈会的记录,补充了该座谈会史料上的缺漏;后者分为“诗坛巡礼”“诗派诗人举要”“旧诗新话”等三篇,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大后方诗歌界的主要成就,同时也论述了“《屈原》唱和”“《沁园春·雪》唱和”的历史场景和影响。西南大学的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也产出了不少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成果。吕进、熊辉、张传敏等的《重庆抗战诗歌研究》(2009)^[14],吕进等编著的《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2015)^[15]都是该中心在诗歌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其他文体类研究,还有廖全京的《大后方戏剧论稿》(1988)^[16]、尹鸿禄的《大后方散文论稿》(1990)^[17]、杨中的《大后方的通俗文艺》(1990)^[18]、申列荣和石曼主编的《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2009)^[19]、尹莹的《小说中的重庆——国统区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2014)^[20]等。当然,近年来不少博士和硕士论文也对大后方的小说、报告文学、话剧、文学期刊等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大后方的翻译文学也成为近年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熊辉的《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史论》(2018)^[21]研究了大后方对俄苏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国别及国外文艺理论的译介情况,其《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研究》(2018)^[22]则对“文协”、战国策派、西南联大、七月派、中苏文化协会等大后方社团对国外文学的译介进行了研究。

四是大后方文学组织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研究成为大后方文学组织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史料选编》(1983)^[3]的出版为“文协”的研究奠定了史料文献基础。段从学的博士论文《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从史料角度重新考证了“文协”作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组织的历史形态和发展变化,并从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关系切入,对“文协”参与通俗文艺运动、“民族形式”讨论、军队文艺传统的开拓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23]。熊辉的《“文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2013)一文认为,“文协”属于非政党的文学组织,其构成主体、文学主张和社团特征等都表明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24]48-51}。还有不少硕士学位论文围绕“文协”的文化动员、文学翻译、在渝活动或分会活动等进行研究。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研究,也成为近年研究抗战时期文化组织的重要对象。阳翰笙^[25]、钱远铎^[26]、王亚平^[27]、臧云远^[28]等的回忆和日记成为不少研究者参考的主要文献,近年随着文学研究史料化的推进,已有研究者指出阳、臧等的回忆有后设叙事的成分,其主观成分和意识形态倾向不免遮蔽了一些史实。如段从学就阳翰笙在回忆第三厅的文章中对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出自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的安排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23]8}。在研究中,应对这

类回忆文章和日记保持一定的距离,既在甄别的基础上采用其中罗列的史实,也避免征引当事人的某一带有倾向性的说法和主观猜测,对其中涉及的内容应进行辨析和考察,力图澄清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五是后方报刊研究。报刊研究正成为近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等重要报纸及其文学副刊的研究正在汇成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一股新潮流^①。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报刊与大后方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关系、报刊与各体文学的关系、从纪念活动的报道考察和解读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等方面。报刊所刊载的历史报道、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等被视为进入大后方文学历史现场的可靠史料,报刊研究能够进一步透视出大后方文学、抗战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倾向。

六是后方文学活动研究。除前文论及的文艺座谈活动外,文艺纪念活动、展览活动、文艺节日活动、慰劳援助活动等也逐渐为大后方文学研究界所关注,并产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果。抗战时期大后方举办的人物纪念活动有屈原纪念活动、鲁迅纪念活动、高尔基纪念活动和“寿郭”“寿茅”及老舍创作周年纪念等,文艺节日和展览活动包括戏剧节、诗人节、艺术节、西南剧展等,慰劳援助活动包括端午劳军活动、作家战地访问活动和西北慰劳活动、保障作家生活援助贫病作家活动、献金运动等。其中,纪念活动和文艺节日的研究主要体现为通过这些纪念活动和文艺节日庆祝活动考察其历史背景、举办目的,从中透析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化权力上的争夺问题^②。

纵览抗战胜利以来的70多年,学界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是依托史料整理的同时进行大后方文学的历史化建构,而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热也涌入了大后方文学研究中,形成了史料重新发掘与大后方文学文化重构等研究活动齐头并进的现象。不少历史现象随着史料的打捞梳理获得了创新性阐发,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抗战大后方与延安文艺同样都是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富矿,战时不同的文学形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的激荡下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也有学者注意到大后方作家的战时文学创作已经呈现为政治、文化、文学等多种话语的交织^③。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推进大后方文学研究,需要

在史料钩沉上钩隐抉微,在理论阐释上创新话语,在文本解读上别开新路;同时,也需要开拓研究中的一些新方法、新视角,建立更加完善和更具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如此将能为大后方文学研究带来更加丰硕的成果。

二、大后方文学的内涵及时间边界

何为大后方?一般来说,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全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又称抗战大后方。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将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29]2-3}。其后,大后方用来特指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历史学者潘润认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需要从价值边界、空间边界、时间边界三个维度进行界定。抗战大后方的核心价值属于“国防战略的范畴”,是战争时期“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其空间地域上以重庆、四川为核心;时间上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在抗战的发展进程中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30]12}。这一界定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角度明确了其内涵和外延,对研究大后方文学动态演变的历史进程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大后方文学则特指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具有民族解放特质的文学。这一概念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边界。

大后方文学的时间起讫点在哪里?经历抗战历史的矛盾认为“实开始于‘七七’以前”^[31]。后来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将1938年10月作为大后方文学的起点,1946年5月作为大后方文学的终点^{[9]9}。其划分依据就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后方成为主要的国民党统治区,大批文艺团体、文化人和文艺刊物落户重庆^{[9]10}。这种起始点的划分在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细细考量,其时间节点划分缺少更为充实的历史依据。根据历史事实,1937年11月20日,国府迁渝^{[29]5-6};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改重庆市为直辖市^{[29]51};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29]87}。重庆在大后方的中心地位自是随着国府迁渝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而形成。以1938年10月作为起点,除军事上的武汉沦陷迫使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迁渝之外,显然缺少足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文学事件作为支撑,也容易忽视此前大后方文学已然在发展途中的既定事实。

大后方文学应以1938年3月为起始点。作为

文学运动,其时间节点的划分显然应以文学事件作为主要依据,而政治史、社会史进程只是参考依据,不宜作为唯一依据。有研究者已经指出,抗战文学实际上先于“全面抗战”而发生,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大量书写及其文艺活动的产生,将这一事变“塑造成全面抗战爆发的标志”^{[32]99}。大后方文学的形成显然不是某一时期骤然出现的,它与其他文艺活动一样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1938年,虽然文学创作的实绩并不理想,但大后方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围绕“两个口号”的论争没有销声匿迹,并演化为救亡和启蒙的话题在电影、戏剧界继续展开讨论。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自“五四”之后一直未曾断线,众多文学社团在此期间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再者,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由长沙西迁昆明,并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师生在南渡之后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也聚集了不少社团和文学作者,形成了独特的战时文学景观^[33]。这些文学活动都为抗战大后方文学运动的形成做了准备,也以事实印证了抗战大后方文学在1938年初期已经形成。

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进步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气象,民族解放、抗战建国意识上升为文艺界的主旋律,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文艺界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34]183}“九·一八与一·二八后,文艺界无日不在忧心国防……救亡图存,咸具此心。”^{[35]181-182}“文协”成立后,办会刊、开座谈会、开展通俗文艺运动,倡导“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战时文艺动员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参与西北慰劳团,开展救济贫病作家活动等,推动了抗战大后方文学渐入佳境。迁往重庆后,“文协”的文学活动更加多样,带动了整个大后方文学枝繁叶茂。“文协”成立不到一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因抗战宣传的需要于1938年4月1日成立,形成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厅文化圈。在迁往重庆之前,“文协”和第三厅的活动影响已经波及了大后方。可以说,正是有了“文协”和第三厅等的努力,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才有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果。

大后方文学的结束时间则在1946年5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抗战文学运动并未戛然而止,郭沫若、茅盾、老舍、梁实秋、胡风、阳翰笙等一批文化人仍在大后方从事文艺活动,作为抗战期间代表作的《四世同堂》《寒夜》等正在创作期,大后方文

艺界还维持着表面的一团和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为大后方文学的标志性刊物《抗战文艺》终刊,不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文艺界的左翼和右翼作家已截然对立,内迁的不少文化人也陆续离开重庆、成都、桂林等大后方主阵地,这才使得大后方文学的余音中断。研究者认为“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终刊可以作为“大后方文学结束的重要标志”^{[9]12}。“文协”会刊的终结,既是大后方一系列文艺活动终止的反映,也是另一种文学形态即将呱呱坠地的征兆。

以“文协”成立的1938年3月作为大后方文学的起点,以《抗战文艺》终刊的1946年5月作为大后方文学的终点,既体现了以文艺标准界定大后方文学分期的原则,同时也基本契合了抗战文学的发展脉络。

三、大后方文学的地理边界

就地域而论,大后方文学横跨了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形成了重庆文坛、昆明文坛、桂林文坛、成都文坛、贵阳文坛、西安文坛等多个抗战大后方文学据点。因日寇的侵略,东北、华北、中南地区相继陷于战火之中,传统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不幸沦陷于敌手,大批刊物停办,出版社被迫停业,依刊物和出版而活跃起来的作家,除少部分因种种原因留在沦陷区或隐忍搁笔,或附伪苟活外,大部分或前往延安或南迁国统区大后方。传统的文化地理格局被打破,新型的文化中心崭露头角。以群在描述当年文化大变迁时说:“近几十年来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先遭受了敌人的侵袭,苦战三月,终于沦陷,连租界的‘安全’也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全沪的出版业,就都被迫陷于停顿状态中。而一向定居在上海,靠卖稿为生的作家们的生活秩序,也就完全破坏了。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他们不得不离开安定的故居。”“一方面毁灭了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则建立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跟随着作家们的踪迹,较小规模的文艺团体和刊物也陆续产生了;这使一向很少或不曾接触到新的文艺的内地,也开始发芽滋长起了文艺的花朵,而文艺读者的范围,亦有猛速的扩大。”^[36]西部凭借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在战时成了避难同胞更适合的居所。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驻地,也担任了战时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的角色,拥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一全国性文艺组织,凝聚和吸引了众多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此以笔为戈,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持久抗战。重庆作为大后方文学的中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其

因行政主导而带来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吸引了文化教育等各方资源聚集。当时,一大批优秀文化人聚集在巴山渝水,形成了闪耀一时的文化景观。据粗略统计,抗战期间活跃在重庆的文化人有200名左右,其中知名文化人就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阳翰笙、张恨水、柳亚子、田汉、艾青、冰心、梁实秋、胡风、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洪深、熊佛西、吴组缃、田涛、赵清阁、石凌鹤、于伶、臧克家、李季野、陈衡哲、张秀亚、丰子恺、陈鲤庭、顾颉刚、章泯、葛一虹、应云卫、陈瘦竹、周彦、宗白华、沉樱、钟敬文、潘梓农、陈子展、梁宗岱、方令孺、李四光、钱穆,等等^{[37]232}。战时陪都的图书出版业也迅猛增长。其中,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共404家,出书8000余种,出版期刊约2000种^{[38]436}。不少知名大学、中学也落户重庆兴校办学,知识分子和文艺团体、教育科研机构聚集,一时形成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与成都华西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的区域性文化群落盛景。

其他如昆明、桂林、成都等地,因大量知识分子内迁和南渡,以抗战为主旋律的文学生产也呈现枝繁叶茂的景象。在云南,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其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汪曾祺、王佐良、袁可嘉等一批师生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群和诗人群,他们对人性和时代的书写与呐喊,已经超出了简陋的教室和宿舍的限囿,而影响了更广阔的中国土地和更久远的时代。在桂林,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备受离乱之苦、无家之痛的文艺团体提供了一方自由的天地。欧阳予倩、田汉主持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通称“西南剧展”)成为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文化盛会,奏响了争取民主、夺取胜利的冲锋号。在四川的成都等地,何其芳、陈敬容、周文、曹葆华、张天翼、沙汀、艾芜、端木蕻良、苏雪林、平原诗社诗人等,随着大内迁或返乡而寓居于此,用诗性语言或小说笔法刻画战时百态,表达个体与群体、希冀与失望之间的纠葛与冲突、融合与挣扎等。

总而言之,一般意义上的大后方文学指在全面抗战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具有民族解放特质的文学。其地理范围主要框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区域,但有时亦根据研究对象而有所拓展,如本领域著名的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将武汉等非传统意义上的西南地区也纳入大后方视野之内。从时间上看,大后方文学以“文协”成立的1938年3月为起点,以“文

协”会刊《抗战文艺》的终刊时间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时间1946年5月作为大后方文学进程上的终点。

注释:

- ①近年有关《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研究的本学科相关著作主要有: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相关论文主要有:张武军:《〈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副刊与抗战文学的发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张立新:《纸文艺副刊与大后方抗战诗歌:以重庆版〈新华日报〉〈大公报〉为例》,《中外诗歌研究》2015年第2期;熊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文艺的引导:以〈新华日报〉副刊为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熊飞宇:《〈新华日报〉1940年有关冰心的两则报道绎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张志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陪都地方戏批评——基于〈新蜀报〉有关史料的考察》,《戏剧艺术》2017年第1期;陆萍:《〈新华日报〉与重庆抗战诗歌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赵伟:《〈新华日报〉与西南剧展》,《抗战文化研究》2015年第11辑。学位论文主要有:孙倩:《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袁丹:《1942年—1945年的〈新华日报〉副刊与国统区文学》,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程艳芬:《重庆版〈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抗战诗歌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孙美娜:《重庆版〈新华日报〉文艺副刊叙事诗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敦枫:《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副刊上的文艺论争》,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冯晓旭:《〈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副刊抗战话语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②关于大后方纪念活动、文艺节日的专题研究成果有:王本朝、刘志华:《鲁迅纪念中的胡风声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王学振:《〈新华日报〉的鲁迅纪念》,《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李光荣:《抗战期间昆明的鲁迅纪念》,《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6期;梅琳:《旗帜与训诫:1938—1940年〈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纪念鲁迅活动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谭徐锋:《政治寿?文化寿?——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本末》,《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刘奎:《现代诗人节的确立与新诗人的诞生》,《江汉学术》,2017年第1期。
- ③如李永东:《战时国家之城的形象建构——老舍的重庆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李怡:《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

史命运》,《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李永东:《逆写战时国都——1941年茅盾在香港的创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周勇,任竞.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 [2]袁佳红,王志昆,曾妍.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文化[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 [4]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 [5]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北京:现代出版社,1947.
- [6]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7]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 [8]吴野,文天行.大后方文学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 [9]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0]苏光文.大轰炸中的重庆陪都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 [11]刘勇,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 [12]龙泉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诗歌研究史料选[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 [13]苏光文.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抗战诗歌研究史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 [14]吕进,熊辉,张传敏,等.重庆抗战诗歌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5]吕进.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 [16]廖全京.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大后方戏剧论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 [17]尹鸿禄.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大后方散文论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 [18]杨中.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大后方的通俗文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 [19]申列荣,石曼.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0]尹莹.小说中的重庆——国统区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 [21]熊辉.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 [22]熊辉.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23]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D].北京:北京大学,2006.
- [24]熊辉.抗战诗歌的几种特殊传播方式[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8-51.
- [25]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 [26]钱远铎.我所了解的政治部第三厅[J].武汉文史资料,2015(8)(9).
- [27]王亚平.永远结不成的果实[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 [28]臧云远.文苑拾影[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 [29]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 定都 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 [30]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13.
- [31]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J].中学生(战争与和平),1949(10).
- [32]张武军.《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副刊与抗战文学的发生[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94-102.
- [33]李光荣.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34]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J].文艺月刊,1938(9).
- [35]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J].文艺月刊,1938(9).
- [36]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J].文艺阵地,1938(2).
- [37]肖效钦,钟欣绵.抗日战争文化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232.
- [38]唐慎翔.抗战期间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及图书业[M]//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于 湘]